

台灣在美 中 戰略競爭下的地緣角色 與策略選擇

蕭衡鍾

聯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摘要

近年由於美中關係的激化與動盪，使得台灣在美 中 台「戰略三角」的互動框架中難以置身事外，角色也日益重要。在三組雙邊關係的態勢中，隨著美中關係惡化難解、美台關係友善緊密，致使兩岸關係惡化僵持，也代表著台海局勢的緊張，進一步惡化為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也大幅提升，本研究的重點在於台灣如何避免受到影響。

關鍵詞：戰略清晰、戰略模糊、一中政策、美 中 台關係、戰略三角

壹、前言

後冷戰時期世界經濟和軍事重心正在從西方逐漸轉向東方，亞太地區也因此成為未來全球經濟和軍事走向的引領者，2002 年中國首次提出「和平崛起」概念，在國力評估指標中「國家資源」、「國家表現」與「軍事能力」每年均有顯著的成長，除了成為區域強權外，也間接挑戰美國霸權地位，成為美國戰略上面臨的最大挑戰。

美國自歐巴馬政府第二任期起，為防止中國在亞洲乃至全球爭搶話語權和影響力，動用亞太區域盟友及『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等資源實施「圍堵」策略，但未能有具體效果。故在國內和盟友對中國威脅日益增長的因素刺激下，歐巴馬政府表示有責任、有必要對中國進一步採取強硬手段；另指出中國若從區域勢力範圍的角度來理解世界，則將可預見美中衝突的潛在可能。而這些作法並沒有改變中國，也未能達到遏制中國的目的，反而促使中國加速在亞太區域及全球的戰略佈局；歐巴馬政府從「重返亞太」(Pivot to Asia) 至「亞洲再平衡」戰略 (Rebalancing Asia)，除展現軍事實力及區域影響力外，也確立了後續繼任的美國總統必須面對與中國「戰略競爭」的態勢。

隨著川普執政、習近平解除了任期限制以及台灣政府「聯美親日、抗中保台」的對外思維主軸，此時期東亞火藥庫的煙硝味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還要濃烈，美中兩大國都端出了不同的因應之道。美國將日本首先提出的「自由與繁榮之弧」、「亞洲民主安全之鑽」逐步實現為「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觀」的區域戰略，加強了西太平洋及印度洋的戰略地位，積極整合了東亞地區及南亞地區的盟國，讓歐巴馬時代的「再平衡戰略」更加進化，也可以解讀是面對亞太區域強權中國崛起所做的圍堵。

對比中國「一帶一路」的區域戰略、東海防空識別區劃設以及南海島礁軍事化等作為，被視為嚴重影響美國盟國利益與區域的穩定發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立，更讓許多國家陷入債務的泥淖中，破壞了脆弱經濟體系，進而滿足了中國的戰略布局，逐步朝向「朝貢體系」前進，尤其「海上絲綢之路」與美印太戰略重覆性高。因此，美中之間的「修昔底

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就在美國回應中國崛起的威脅中產生，未來區域內美中各領域的競爭與衝突勢必加劇，區域內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置身事外，各國如何在安全議題下突顯自我價值，進而找到平衡點更顯重要。

拜登上任後由於受到川普政治遺緒的影響，以及中國在各層面給予試探性的施壓，美中之間的緊張情勢仍未獲得緩解，使得拜登有別於之前民主黨歷任總統的風格，除了延續川普政府路線、定調對中國的「戰略競爭」狀態外，在競爭手段上也更加多元及靈活，目的也定調在與中國展開長期的「戰略競爭」為目標，並以重拾盟友信任及鞏固國內穩定等兩項關鍵策略，在科技供應鏈及貿易關稅上持續與中國抗衡，同時在與各國多邊會談上也積極主導與凝聚「抗中」共識。

拜登政府調整步調重啟競爭，目的為了是在美中競爭的棋局中獲勝，而不是為了妥協，故某些層面的競爭仍保有或許會更加激烈的可能性，同時，由於拜登政府對中國的競爭態勢也是參眾議院兩院的共識，若想要對中國採取比較寬鬆的外交政策，也不可能脫離這個共識的框架，因此拜登一改川普所強調單邊主義「衝突」(confrontation)的外交模式，轉為多邊主義所體現的「再接觸」(reengagement)戰略。拜登政府對於中國下的第一手棋就是「美中阿拉斯加高峰會談」，同時善用其「聯盟戰略」，祭出了新的島鏈圍堵戰略，以「印太戰略」為框架，並通過「五眼聯盟」(Five Eyes)、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美英澳「軍事安全合作夥伴關係」(AUKUS)，還有「美日安全諮商(2+2)會議」以及「美韓安全諮商(2+2)會議」等聯盟機制的落實，來展現各國對於防範中國勢力擴張的合作。

而美台關係也由於上述因素，故拜登政府在處理台灣議題上更為穩健，除延續川普政府時期利用「台灣牌」的方式刺激中國外，從其一系列的友台措施可看出，拜登政府並未因此而犧牲掉美台關係，讓美中台三邊的「戰略三角」(strategic triangle)關係持續川普政府後期的狀態。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21)在2021年1月發佈的「年度預防重點調查」(Preventive Priorities Survey)中便顯示，美中兩國在處理台灣問題上的分歧，產生軍事衝突的機會加劇，這是美國繼朝核問題之外，在該地區面臨到的第二大威脅。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麥馬斯特 (Herbert McMaster) 也針對台海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表示, 風險最大的時間從 2022 年起, 到北京冬季奧運會和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之後, 台海將成為軍事衝突的「最重要的引爆點」(most significant flashpoint) (Fang, 2021)。對於美中即將在台海衝突的急迫性, 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 (Philip Davidson) 上將也在美國企業研究所演說中指出, 他在過去的幾個月裡, 觀察到解放軍在台灣及其周邊地區的空中活動有所增加, 因此對於台海安全在未來六到十年間的走向深感擔憂 (Mehta, 2021)。由此可見, 美中「戰略競爭」態勢在拜登政府任內的持續與加劇, 對於台灣的影響、以及台灣該如何應對, 都應審慎看待。

在美中兩強競逐的結構因素下, 台灣所面臨對美中進一步表態的壓力越來越大, 故必須重新考慮所有避險 (hedging) 的策略, 做出相對應的政策回應。台灣在川普政府上任後選擇了傾向美國的政策, 美國也在『台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亞洲再保證倡議法』(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台灣友邦國際保護暨強化倡議法案』(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 of 2019, TAIPEI)、各財政年度的『國防授權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等多項法案, 以及美國對於「六項保證」(Six Assurances) 的重新表述下, 日益增加對台灣的承諾, 以應對中國的威脅。

貳、美國的戰略轉移與台灣的地緣角色

「現實主義」的世界就是「強者說了算」的世界, 自從美國與我國斷交後制定的『台灣關係法』到現在的『國防授權法』、『台灣旅行法』、『台灣保證法』、及『台北法案』等友台法案, 從高階官員互訪到軍售模式由「包裹式」轉為「常態化」等趨勢, 都可看出美國不同時期對台灣有不同的戰略定位, 而一舉一動都牽動著兩岸關係的敏感神經。

台灣在第一島鏈中的重要性及角色, 向來有「不沉的航空母艦」之稱, 位於第一島鏈中心的台灣, 在區域安全與地緣戰略上的戰略價值也因美國「戰略轉移」的利益考量而轉變, 從 1949 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 美國原本

採取袖手旁觀政策，企圖從國共內戰中脫身，但後又因為韓戰爆發，轉而支持台灣作為牽制共產政權勢力擴張的夥伴，到了冷戰期間又為了利用中國圍堵蘇聯，對台灣的政策也隨之產生質變，放棄與台灣（中華民國）過去的關係基礎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 1954*），轉而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三個公報為政治基礎的外交關係。

美國與中國先於 1972 年簽訂了『上海公報』，確認美國認知到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美國對此不表異議；復於 1979 年簽訂『建交公報』，同時與台灣「斷交、廢約、撤軍」，因而讓美台之間失去關係基礎；至 1982 年簽訂『八一七公報』，華府同意每年遞減對台軍售額度。美國國會旋於 1979 年 3 月通過具有法律地位約束性的『台灣關係法』（TRA），明訂有義務提供台灣防衛性武力，成為美國與台灣（中華民國）斷交後的關係基礎。另外，在『八一七公報』簽署後，美國雷根政府提出了「六項保證」，強調美台雙方斷交後的關係，不因『八一七公報』而有所改變。但這「一法三公報」迄今仍是各自解讀，最被討論的詞彙就是「一個中國政策」，一直以來都被當作美國對於美中台三方互動關係的定海神針，策略性的模糊讓美國得以視當下的國家利益彈性操作，所以當美國政府在面對中國時，就會強調一中政策裡面的「三個公報」；而於面對台灣時，則會強調『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

但對於中國來說，其「一個中國原則」的三段論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此原則也融入在他們所採取的外交策略，每當與其他國家建交時，都會要求一併將這個「一中原則」放入公報，不過世界各國的官方立場也不相同，操作詞彙也會讓許多不同的動詞出現，例如認知、理解(understand)、尊重(respect)，而傾向中國立場的國家，有的會用支持(support)、遵循(adhere to)等字詞，幾乎看不到用「承認」這個字眼。

要說美國如何把握與掌握台灣在第一島鏈地緣角色中最核心的利益，那就是通過軍售一途了。美中衝突至今，中國始終認為美國違反了在 1972 年接受的「一中原則」，這包括美國最終將停止所有對台軍售、接受台灣是

中國的一部分等方面在內。不過從 1982 年的「六項保證」中可以看出，美國並不完全站在中國的立場，在各說各話的情況下，實際上只是一個解讀的問題罷了，但不變的是「軍售」作為台美關係中最核心利益的位置。

台灣每年國防預算約 100 億美元，相較於中國大約差距高達 23 倍之多 (SPRI, 2021)，其支出分散在人員維持、作業維持、軍事投資等三大項目，編列以「國防預算將隨 GDP 等比例成長，每年增加額度不低於上年度國防預算 2% 為原則，另視武器裝備採購需求外加 1%，如有重大武器採購案，將以特別預算支應」為指導 (BBC 中文網，2017)，而其中軍購的品項及金額是最無法預測的，往往是美國賣什麼給台灣、台灣都得買單，過去售給台灣的武器也多屬防禦型為主，雖常被戲稱為繳交保護費，但軍售確實也是美國對台海安全最實質的保障 (吳建德、張蜀誠，2019)，藉此放慢失衡的軍力，使解放軍不敢冒進。

而強調「和平透過實力」的川普政府與拜登政府，其對美台軍售的重視其實早有跡可循，美國對台軍售的態度也越來越不在乎中國的反應，期打造台灣成為「亞洲北約」中的要塞堡壘，尤其是 2019 年同意售予提升台灣空防能力的 F-16C/D Block70 新式戰機，在立法院審議的法案與預算案中火速通過，無論執政黨、在野黨都同聲表示贊成，我國國防部也發動媒體戰大肆宣傳此採購案，讓後續一連串的「常態化」軍售取代了以往之「包裹式」軍售，不再積累軍事銷售項目，而是比照處理盟國的方式，對其單一案件立即進行處理。由此可見，無論在美國政黨如何輪替，以「中國威脅」共識的政策方向不會改變，台灣已成為美國重要的盟友，協助台灣不被「武統」已深鑄在美國的兩岸政策中，基於相同的理念及共享的價值，反中及親台的音量也遠遠勝過親中派，犧牲台灣、與中國交好的解決方法在美國政治上目前是不可行的 (Miller, 2017)。

同時，美國軍售給台灣的武器，從過去的以防禦型為主、轉而涵蓋攻擊型武器在內以因應兩岸軍力的大幅失衡，更是美國對台軍售案中的重要突破，因為包括多管火箭系統、增程型距外陸攻飛彈及海岸防衛系統等武器均可對解放軍進行地面制壓，打破了所謂「防衛性武器」的界線，有效增強了反制打擊能力、填補了美國在第一島鏈圍堵圈中的火力網空隙，美

國也更為強勢、主動地介入跟主導台灣的整體防衛作戰戰略規劃。在此情況下，對比我國同類型的國造雷霆 2000、萬劍彈、及雄風反艦飛彈等武器，如何在國產與外購之間取得平衡，更考驗了台灣的財政能力與國防自主政策，特別以當前的「國艦國造」政策來看，相關核心技術仍是需要美國的支持與移轉的，形成了兩難。

在美國對台灣是採取「戰略清晰」抑或「戰略模糊」的爭議方面，其實美國始終靠著結盟、經濟和軍武等三個方面擴展其勢力，以其『台灣關係法』作為台灣「堅若磐石」的盟友，美台雙方在政治、經濟及軍事三個方面，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包括民主、法治及自由）、「緊密的貿易、產業合作」（特別是台灣的半導體供應鏈）及「軍事安全合作」（意指 1949 年之後依賴美國的軍售及斷交前的協防），「印太戰略」可以說是開啓了台灣的戰略契機，面對中國崛起勢力的擴張與解放軍的現代化，台灣不再是孤軍奮戰，而是可以協同印太地區相關國家來全面展開合作。

但美國始終以「戰略模糊」的策略來保持美中台結構性的穩定格局，防守不斷以「切香腸」與「剝白菜」等戰術循序漸進地發動「灰色地帶」衝突的中國，「灰色地帶」是介於戰爭與和平之間的「對抗狀態」，一個國家不必實際訴諸正規軍事武力，就能尋求從另一個國家獲得政治、經濟或領土利益。「灰色地帶」也是一個介於衝突與現狀之間的「空間環境」，在此空間引發之衝突充滿政治、安全、心理和經濟方面競爭。

如此一來，既可使中國摸不著頭緒，也能防止台灣貿然做出可能具有挑釁性的動作（李俊毅、許智翔，2020）。「外交關係協會」質疑美國在面對崛起的中國時，「戰略模糊」是否還有其嚇阻的可信度（credibility），建議拜登政府應改採「戰略清晰」，明告中國倘若對台動武，美國必將回應。儘管兩派說法引起學術界激辯（陳亮智，2020），但面對台灣是否「搭便車」的質疑，從時任美國戰略司令部司令的海騰（John Hyten）上將所稱「美國並沒有一個清晰策略以因應灰色地帶的競爭」（美國之音，2019）。可知，「離岸平衡」策略一直是美國的外交準則，台灣仍必須自立自強，表現捍衛領土的決心，以抗擊中國操作「灰色地帶」衝突對台灣安全的不斷侵蝕。

參、台灣面對的威脅與挑戰

「權力」是國際關係研究中極為重要的元素之一，它對國際關係的意義如同「貨幣」之於經濟學，在沒有最高政治權威的「無政府狀態」(anarchy)下，國際政治中的大國互相「抗衡、爭霸」，大國極盡手段擴張國家利益來取得權力達成均勢，而小國似乎只能選擇要向哪一方「扈從」，也就是華爾滋 (Kenneth N. Waltz) 所提出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美中兩強在印太區域的布局更是戰略關鍵節點，任何的不確定因素，都會影響著未來戰略環境生存空間，而國家意圖的不確定性讓大國在「安全困境」下只能依靠自助維繫安全，大國追求「權力極大化」，極力追求全球霸權的地位掌握國際體系擁有無法對抗的力量，所以對身處印太區域的國家來說，在美中兩強各自印太策略牽動及區域局勢不安等因素的制約下，如何以國家利益為首重，從自己的戰略位置、政經及軍事層面找出價值，攸關國家未來的生存發展。

國際關係中的「現實主義」適用於現在的世界，它所代表的就是「生存」及「安全」為國家最重要的目標，無論是政治上威權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對抗，還是經濟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挑戰，亦或是軍事上因為「安全困境」而造成的軍備競賽，都讓世界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國家利用各種工具來維護國家利益，強權國家陷入一個為權力永無止境的鬥爭中，長久以來美國通過「離岸制衡」與「境外決戰」的策略造就了許多境外的「代理人」，讓區域局勢更加不穩定，但往往當其行使軍事手段時，正當性卻很少受到質疑。

美國對台灣安全的戰略價值因「戰略轉移」的利益考量而轉變，如今東亞的權力平衡隨中國的崛起而改變，美台關係顯著提升、台海安全也受到美國進一步的重視，西太平洋的弧形地帶成為防範中國勢力擴張的防線，突顯出了台灣的地緣戰略價值，「台灣牌」成為美國抗中的籌碼，可以說，美台關係演變最關鍵的因素就是美國為了國家利益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布局，台灣位於第一島鏈中間位置，中國一旦突破，美國在亞太布局將一分為二的。

而台灣對於美國的重要性除了因為地理位置的戰略利益外，還有因為台灣與美國擁有相同的自由民主價值、也是美國重要的貿易夥伴，使台灣的存在與價值合乎美國的國家利益，才值得美國協助其提升自我防務能力。然而在事實上，美國始終對中國及台灣進行「雙重嚇阻」與「雙重保證」的兩手策略，一方面向中國傳達美國對武力犯台的舉措不會置之不理、卻又向台灣傳遞要有自我防衛決心與能力的態度，另一方面又向中國表示其始終信守「一個中國」政策、但又向台灣保證美國始終是台灣最堅實夥伴的「堅若磐石」的承諾，讓美台關係可以說是一種「有實無名」的關係。

台灣問題對中國來說，已被意識形態及民族主義的邏輯思維形塑著。意識形態上，領土主權為核心利益，讓中國領導人有強烈的動機改變兩岸分治與中華民國事實存在的情形，進而導向統一的終局。在面對西藏、新疆及香港等問題下，是不可能對台灣妥協的，雖然「和統」為其主要手段，但「武統」也是其不願放棄的手段，兩岸統一的戰略安全利益在於吸收台灣的經濟和軍事資源，增強解放軍對於西太平洋投射軍事力量的能力，成為一艘中國沿海的巨型航空母艦（Mearsheimer, 2014）。

而在民族主義思維方面，中國近代飽受欺凌，主權屢失，淪為各國奴隸的「半殖民地」，所以對於「兩岸必將統一」、堅持「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向來堅定明確，也是中國國家認同及確保政權合法性的核心要素之一，在無法再仰賴經濟的成長確保政權的隱憂下，只好採取最後的手段，激起好戰而帶著報復心態的民族主義，對領土主權絕不妥協。故台灣問題關係到中共政權的正當性，同時也是美中關係的核心問題之一。

過去中國對領土主權爭端採用三種最常見的處理方式及案例有三種，第一種是不能談判、也不容質疑，就像是台灣問題；第二種為名義上容許共同開發、分享利益，例如釣魚台及南海爭端；第三種是通過協商談判來化解爭議，就好比黑瞎子島的主權歸屬。而在台灣問題的處理方式上，還有一項需要去考量，就是地理位置，台灣是中國要從陸權轉為海權國家的中繼站，不像因俄羅斯與之還有著共同安全空間的陸上邊境、較有共同利益般。

綜觀歷任中國領導人對台灣發表的重要宣示，都會因台灣執政者的態度做出調整，但「一個中國」的基調始終未曾改變，實現台灣統一始終都

是任內的重要目標，鄧小平將毛澤東時代的「解放台灣」轉變為延續到目前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政策；江澤民基於台灣實現民主化、受到美國支持的情勢，採取了武力威懾；胡錦濤在與美國協調的同時阻止台灣獨立的企圖，並且提出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以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的發展為背景，成功地實現了對中國有利的兩岸關係局面。

然而，侑於由此轉向統一的政治對話幾乎毫無進展，使得在習近平上台後發現「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路線陷入了僵局，對民進黨政權的不信任和惱怒，讓他在十九大時強調「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更明確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根本性質就是基於「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表明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也不是「一中一台」，大陸與台灣本同屬一個中國。2019 年底，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與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的艾思博 (Mark Esper) 舉行會晤時，也表示美中雙方的兩軍關係是兩國關係的「穩定器」，中國致力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但決不容許台獨，要求美國要慎重妥善處理台灣問題，不要給台海局勢增加不穩定因素。

中國始終認為像是「耽誤和平崛起」、「美國介入風險」等讓其不對台灣動武的顧慮是所謂的「假議題」，並清楚地刻畫出了對台動武的底線，包括有台灣宣布獨立、發展核武、外國軍隊派駐台灣等，對台政策也逐步從「反獨」走向了「促統」的進行式，認定「促統」將因時間越久，導致疏離感越重、時間壓力越大，因此面對台灣問題要保持有意志、有決心、有能力處理的「戰略定力」，不怕民進黨、也不靠國民黨。

而台灣面對兩岸關係，在 2008 年馬英九主政時期，兩岸進入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階段，互動的性質是「先經後政」，處理彼此衝突採「治權互不否認、主權互不承認」的方式，且政治用「九二共識」創造模糊性的戰略，但強調的則是「各自表述」。接任的蔡英文在面對中國方面，則是改而採取了「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不在壓力下妥協、不走回老道路」的四不政策，也改變了馬英九政府時的「親美、友日、和中」政策，改為「聯美、親日、抗中、獨台」的政策。

面對從毛澤東時代「站起來」、鄧小平時代「富起來」到習近平主政下

「強起來」的中國，其崛起讓經濟綜合實力大增，直接影響了軍事實力與手段。台灣過去掌握空優、跨越中線偵照沿岸的優勢，至今已角色互換，解放軍海空軍從初步的出海能力進展到了頻次日益密集的常態化「繞島」航訓，持續侵擾我國西南防空識別區與東南防空識別區，不只企圖測試台灣與美日的反應時間與能力，壓縮我國空軍的反應時間、增加台灣空防壓力，甚至遭驅離的解放軍飛行員還在無線電中聲稱「沒有所謂的海峽中線」一事，可以說是嚴重的挑釁動作。

中國通過「超限戰」的思維，在未達大規模戰爭門檻的「灰色地帶」衝突施壓台灣，採取多樣化的鬥爭手段，測試台灣反應並製造犯錯的機會，進而達成其目的（鍾志東，2020）。該運用方式多元，以各式不同手段鋪天蓋地的侵襲著台灣，可以說是無煙硝的戰爭。以外交為例，中國採用「以經逼政」的干涉模式滲透著我國友邦，以輸出「中國模式」來壓制萌芽中的「台灣模式」，讓我國在外交處境上空息，此舉除了是中國運用「灰色地帶」對台灣血淋淋的運作模式外，在戰略態勢上更是穿透了美國盟軍第一島鏈的戰略位置，有利於解放軍掌握太平洋與印度洋的重要據點，讓美國家門口的南太平洋彷彿成了第二個南海（蔡榮豐，2019）。就此可知為何 2019 年索羅門群島與吉里巴斯相繼與我國斷交、轉而和中國建交時，美國要如此緊張，其原因不外乎一旦中國的勢力拓展到南太平洋後，這兩國將成為監控美軍在太平洋地區活動的灘頭堡，故對於中國對台灣操作「灰色地帶」衝突的應對，我國政府應當集結各部會，研擬各項應對腳本，以面對防不勝防的出招。

特別是在面對「灰色地帶」衝突的新型態作戰威脅方面，戰爭的型態已從 18 世紀的陸權、19 世紀的海權、20 世紀的空權發展到了 21 世紀的電磁權，已經是包含了「陸、海、空、天、電、網」的多維作戰形態。中國積極發動的新形態作戰模式就是「認知作戰」（cognitive warfare），包含了信息戰、宣傳戰、輿論戰以及訊息戰，現今除了看得見的戰爭，「信息戰」成為看不見的戰場，而且天天發生，解放軍的戰略支援部隊便具備這些高科技能力。

「網軍」這類隱形軍種的出現，助長了中俄等潛在強權每年持續擴散

這種廉價卻不甚複雜的技術，透過電腦病毒、木馬程式、釣魚軟體等手段，破壞資訊基礎設施，例如俗稱「影子部隊」的解放軍 61,398 部隊，近年來更以中國製品牌網通設備為媒介，監控使用者動態，蒐集軍事及商業情資，進而成為中國軍武工業及高科技產業的技術獲得途徑，形成資安黑洞，這也是為何我國與歐美各國政府大多要求政府資安裝備禁止使用中國製產品，並將華為 (HUAWEI)、中芯 (SMIC) 甚至是抖音 (TikTok) 等軟體列入黑名單的主因。

在軍事上，當兩岸發生軍事衝突時，解放軍最有可能對台灣採取的行動為「由演轉戰、猝然攻擊」，以聯合軍事威懾、聯合封鎖作戰、聯合火力打擊、聯合登島作戰等手段取得「制空、制海、制電磁權」等三權，以貫徹其「兵貴勝，不貴久」、「首戰即決戰、速戰速決」的攻台戰略。於作戰初期，解放軍恐先以海空全面封鎖、導彈全面空襲、電子戰攻擊、敵特攻與潛伏人員先行等方式對台灣進行「點穴戰」，癱瘓我國指管中心、機場、雷達站及飛彈陣地，繼之以空、機降突擊奪控中樞、機場等目標，實施三棲進犯，來達成「以戰逼降」的目的。尤其是航空母艦加入解放軍的作戰序列，已服役的遼寧號、山東號兩艘航母，雖處於訓練及初步戰力的階段，但航母上的殲擊機及艦隊中的導彈驅逐艦、護衛艦、潛艦等仍構成了內、中、外防區等三層防護圈，進而達到 1,000 公里以上的防禦縱深，對可能馳援台灣的美軍以及我國東部的戰機、船艦造成極大壓力。

解放軍對台作戰模式採取的是「效能作戰」的概念，如同美國空軍所提出的「五環打擊理論」，第一環是指揮控制環 (leadership)，第二環是生產設施環 (organic essentials)，第三環為基礎設施環 (infrastructure)，第四環是民眾環 (population)，第五環則是野戰部隊環 (fielded military forces)。此理論的本質是作用點不同，產生的成果不同，選擇攻擊的作用點越關鍵，獲得的效果越大，所以造成敵人癱瘓，就可以極小的成本獲取最大的戰果，而對重心實施某種程度的打擊，是實現癱瘓的必要途徑和措施，更可產生決定性的效果 (舒孝煌，2016)。

國家是國際關係的主要行為體之一，國際強權透過地理位置與相互間的地緣關係，獲取對資源支配及戰略要點控制等權力，以謀求國家安全與

利益（謝茂淞，2014），因此，地緣戰略就是為了阻止某國控制地緣的心臟地帶，進而威脅自己，美國為了對抗共產勢力的擴張，在亞洲主導了越戰與韓戰兩場大戰，從此之後便以武力常駐此區，聯合盟友以島鏈對中國進行圍堵，以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與戰略利益（蔡志銓、樊兆善，2015）。

而台灣在歐亞大陸與太平洋、東北亞與東南亞的交會處，北臨東海與琉球群島連成一線、南隔巴士海峽與菲律賓相對、東向太平洋、西控台灣海峽與中國相望，以全球的觀點來看，是重要的地緣戰略位置，一來是經貿與能源運輸的要道，一來可有效遏止中國勢力向東突破太平洋，經濟或軍事價值不言可喻，故蔡英文也曾表示「現在台灣不是兩岸關係裡的台灣，而是印太地區的台灣」，清楚地說明了當前我國政府在國際上的自我定位（新頭殼，2019）。

外援有無不可否認會對非強權是否採取避險產生很大的影響，明確的安全承諾會進一步加強國家避險的意願，但若全盤接納，反而不利其避險策略的推展（吳玉山，1997）。雖然有學者認為，美國若切斷自身與台灣的軍事合作、或者在兩岸發生危機時未能妥適保護台灣，對於其他盟友而言，是美國保護無能、不守信譽的信號，不利於美國在區域政治與全球領導權的維繫，因此長遠來看美國是有強烈動機將台灣納入其圍堵中國的聯盟之中的，但是，自從美軍拋棄庫德族、還有撤軍阿富汗之後，這個答案似乎不再絕對，更何況，台灣雖為美國的重要利益、但並非其核心利益，而台灣卻是中國的核心利益，關係到習近平執政的政權穩定與歷史定位問題。

國家是地緣關係上的共同概念，領土主權則是國家的核心利益，如今，兩岸軍力的槓桿已經嚴重傾向解放軍，正當習近平欲以中國自身的實力解決台灣問題、美國又以台灣為其「制中」的一顆有用「棋子」時，相信中國未來除了加劇軍事威脅外，還是會持續結合輿論戰、心理戰及法律戰等「三戰」手段跟『反分裂法』的運作，脅迫台灣接受其政治條件，而台灣似乎也應尋找緩衝的可能，降低「中國威脅」對台灣的壓迫感，以避免最壞的結果、也就是戰爭的發生。

當前，美國屬於維護三角穩定的「夥伴支持者」，而台灣由於受到中國

的壓迫及威脅，成為防止利益被損害所採取的「夥伴抵制者」姿態，中國則屬於藉由在台海的各項嚇阻手段，企圖使台灣屈就於威脅的「孤雛抵制者」的角色。在此情勢中的「戰略三角」動態中，從原本的「羅曼蒂克型」(Romantic) 三角，轉變為美中夥伴、中國孤雛的「結婚型」(Marriage) 戰略三角下，雖然台灣得到了地位的提升，但「修昔底德陷阱」的美中結構因素加劇，使得「戰略三角」的結構的穩定性造成挑戰。而在此「大局」下，一種新型霸權概念「霸權秩序論」(Hegemonic Order Theory)，便從「霸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及「權力轉移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 後被進一步提出闡述。

「霸權秩序論」認為霸權秩序是動態可塑的，進而釐清有關霸權國的成本與收益與崛起國挑戰現存秩序等問題；也可說明霸權與挑戰者之間競爭的關係。「霸權秩序論」重新構建了小國與大國之間的關係，而霸權國家在國內和國際上，跟小國一樣必須得遵守訂定秩序的約束，這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結局又多了一種可能性的解釋。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美中緊密的關係，難以用單純「競爭」或是「合作」的方式來解釋互動的行為，在雙方願意擱置部分利益時，必將邁向進一步談判協議以建構新的霸權關係，而未必以霸權戰爭的結局告終。換言之，只要「修昔底德陷阱」未發生武力衝突或是霸權轉移，則台灣在美中之間或許有更多的戰略空間能夠選擇。因為美中在台海的軍事實力差距日益減少，代表著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也會受到影響，使得台灣在選擇避險策略的調整上有其急迫與必要性，而現今的狀態下則可把握住美台關係穩定的優勢，與中國從善意的累積開始，等待轉變的契機發生，方能謀得我國在美中台三角中的最佳利益。

肆、地緣戰略與地緣政治下的台灣

就台灣該如何避險來說，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國，為維繫著兩千四百萬人的生存發展，當前台灣政府主張在經濟上面臨美中貿易戰遺緒與肺炎疫情的情況下，對世界經濟版圖影響層面極大，當擴大到科技、技術層面時，

原有「台灣接單、中國生產、出口美國」的美中台三角貿易型態勢必面臨重整，應輔導台商以「根留台灣」為避險的策略，以有效避免受到波及，並採取「深耕臺灣、布局全球」的策略，以充裕的科技人才為基礎，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研發基地，善用智慧打群架，塑造國際化、自由化的投資環境，扶植重量級產業打進國際。

至於在外交上，台灣政府主張應突顯有意義的「價值外交」來對比中國「金錢外交」不同之處，並藉由民主化成就來做為爭取參與國際組織的基礎，在各項議題上凸顯台灣的重要性，厚植外交實力；軍事上則是拋棄傳統對抗的「消耗戰」，採取不對稱的「刺蝟戰術」、「豪豬戰術」、「蜂群戰術」與「逆登陸戰術」等作戰思維，在海峽中選擇台灣可以掌握優勢的區域決戰，並運用重層嚇阻手段來發揮聯合戰力，使欲登陸的解放軍不敢越雷池一步。

若從「戰略三角」模式的總體概念來看，形成條件第一為行為者是理性的主權者，有完全的能力可以決定自己的對外行為，也就是自主性，第二為任何雙邊關係都繫於和第三者之間的關係，即使在三方權力不對等的情况下，有第一及第二項的條件仍可構成戰略三角（吳玉山，2000）。美中「戰略競爭」關係的本質，就是既有霸權國面對崛起強權的威脅，進而主動對其提出挑戰，期能維持霸權的地位，也就是「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基本態勢，造成美中台「戰略三角」結構中，美中雙邊關係產生持續性的惡化，由此也間接影響美台、兩岸等雙邊關係的僵化。

以個體角色的視角來看，原本所具有的自主性受到了國家利益、決策者認知及內部政治因素的影響，使得在對外政策方面受到制約因素的影響而無法選擇，由此顯示在美中「戰略競爭」狀態下的美中台「戰略三角」型態是僵化的、導致個體角色上的能動性降低，並激化在此型態中「孤雛」與「夥伴」的對立程度，在美中雙方在「戰略三角」條件中第二項「關切的核心利益」的互不相讓，進一步影響到台灣在第一項條件中「自主性」的弱化。

「修昔底德陷阱」代表的是既有強權面對崛起強權時，對於即將被取代的恐懼，造成競爭及不斷提升的對抗情勢，最後無法避免戰爭的發生。

而在「戰略三角」中若某一方失去另兩方的關切或是失去自主選擇的能力，也就代表了「戰略三角」失去了存在的條件。在當前美中高度競爭與對峙的狀態下，更加突顯了「修昔底德陷阱」中既有強權對於崛起強權的恐懼及戒心，但相較於冷戰時期美蘇對抗的態勢有所不同，不論是在經濟相互依賴上，或者是科技的進步發展，美中雙方極難完全形成「脫鉤」態勢，且現今外交政策工具的多元化，可提供領導者進行更多的選擇，故「競合相生」的狀態也可說明現在美中關係的複雜程度，雙方關係中既存在對抗，也存在競爭與合作，形成了「競爭性共存」的現實關係。

地緣戰略是國家基於地理因素與地緣關係，作為制定國家安全戰略的依據，俾利遂行對外關係（李景治、羅天虹，2003）；地緣政治則是國際政治學的研究重點，任何的戰略學者都無法忽視印太未來在全球戰略布局的影響力。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2014）指出，美國作為全球獨一無二的盟主地位，只有號稱「世界島」的歐亞大陸（Eurasia）可挑戰這既成事實，因為擁有足夠的人口、資源、科技與文化，布里辛斯基還將國家區分為「地緣政治樞紐國家」與「地緣戰略玩家」兩類。

「地緣政治樞紐國家」最典型的就美國在東亞最緊密的盟友——日本，其扮演一個重要的區域防務盾牌，可對區域產生很大的政治、文化影響，故美國有義務審慎培養與日本的關係，使其在遠東安全擔任中心的角色；而中國則是具有能力運用其實力與影響力，改變現有的地緣政治的「地緣戰略玩家」，其潛力及傾向容易造成地緣政治動盪，進而追求區域強權的地位，挑戰世界霸權——美國的政策。「修昔底德陷阱」既有統治強權與崛起強權之間的結構因素，在學界廣泛運用於討論美中關係，而在過去美中台「戰略三角」的研究中，除了冷戰後小布希政府時期曾發生過美台夥伴、中國孤雛的「結婚型」三角模式外，迄今未見此一結構；而自 2017 年川普就任美國總統後，美國外交政策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再次由原本的「羅曼蒂克型」轉變至結構相對不穩定的「結婚型」三角。

值得觀察的是，川普時期的美中關係與小布希政府最大的不同是雙方國力差距的縮短，造成美國不是為了平衡「戰略三角」的考量，而是為了抗衡中國的崛起的壓力，在各方與中國展開競爭的同時，也形成了「修昔

底德陷阱」的結構性因素，使得造成「戰略三角」中的角色、模式的能動性僵化。而拜登政府在對中國「戰略競爭」態勢不變的前提下，在調整競爭手段上對中國施加壓力，可見拜登在上任後，受到美中競爭結構性的影響，美中關係仍是處於「戰略三角」的「敵視」狀態。

但拜登政府與前任川普政府不同的在於，其將美中之間的競合關係給實際地納入了爾後對中國及台灣的政策思維當中，拜登政府對於重啟美中競爭關係的重視程度，可由甫上任兩個月內即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指南》(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發現，相較於川普政府時期上任一年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拜登政府在凝聚應對中國崛起與勢力擴張的策略共識上有其急迫性，除了對於美中之間的競合關係作了表述、希望藉由對話回復美中之間的互信之外，也對於彼此間的分歧爭點及各自核心利益有所了解，希望能在此一穩定基調下，以理性及實力為前提在各項領域與中國重啟競爭。

拜登政府雖然在避免衝突的前提下競爭，但也並不表示會重回歐巴馬政府時代的政策風格，美國為了鞏固並擴大現在的「民主灘頭堡」，也勢必要與中國繼續「戰略競爭」下去。因此，在美中「戰略競爭」的態勢下，相信無論未來美國政府如何論替，這個基調都不會改變，美中未來的發展無論在科技、軍事還是制度上都會持續競爭，能否在各領域上獲得更多志同道合的盟友便是地緣戰略成敗與否的關鍵，但無論執政的美國政府如何更替，美中雙方「競爭性共存」的現實關係將持續主導著兩國的外交政策。

在拜登上任後對於美中「戰略競爭」態勢的認知裡，將外交的位階擺在軍事之上、且把軍事衝突視為最後手段，故對於川普政府時期持續在美台關係突破所造成台海情勢的升溫，拜登政府試圖以「戰略模糊」的穩健態度看待美台關係，對於「是否出兵協防台灣」的議題採取模糊態度，一方面強調美國長期以來對「協助台灣提升自我防衛能力」的安全承諾，另一方面也向中國釋放不要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的信號。但拜登政府所做的不僅於此，除了穩定台海局勢之外，在美台關係建設性的成長的部分，也有做了不少努力，代表拜登政府在看待台灣議題上，是採取較川普政府時期更為務實的立場。

台灣是美國「印太戰略」與「聯盟戰略」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是由於台灣在印太地區的地緣戰略有其重要價值，又與美國在「民主自由同盟」上的價值與理念相同，所以台灣可以在美中對峙的大局下，提供支撐「印太戰略」的功能。對台灣來說，若台灣成為在「印太戰略」的支點，其戰略價值便等同澳洲及印度，可順理成章成為美國印太同盟的一份子，形成美台交流新模式，所以台灣政府便一再強調台灣是「印太戰略」的相關者，而美台夥伴關係則為印太區域和平與穩定的關鍵支柱。但台灣政府卻忽略了，縱然美中是處於「戰略清晰」態勢下的最大地緣競爭對手，但美國仍並未考慮摒棄其長年以來對台灣的「戰略模糊」政策，美國的對台政策還是以符合其「一中政策」為主軸，通過『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個公報與「六項保證」的方式，維持美國與台灣之間的關係。所以，美國對台灣的承諾是不變、但也不會再更清晰了。

美中之間「競爭下的有限合作」仍是未來首要主線，就日本、韓國與台灣在美國的聯盟體系位階來看，美日同盟與美韓同盟的持續發展為次要目標、是美國制衡中國的戰略手段之一，最後的台海議題則是依附於美中關係之下的策略工具和棋子，就像美國賣給台灣某些超出『台灣關係法』範疇的攻擊性武器，背後目的也是想利用台灣的地緣戰略位置，讓台灣替美國來牽制解放軍罷了（蕭衡鍾，2022a）。

然而，對台灣而言，在美中高度競爭態勢下，美中雙方對於台灣問題的重視及操作，雖然更加凸顯了台灣的角色，讓台灣充滿機會與挑戰，卻也讓台灣的「自主性」有了弱化。因為就辯證法來說，在目前台灣政府一味地「聯美、親日、抗中、獨台」的政策路線之下，台灣就更加需要倚靠美國了，不然怎麼會改變原本規劃，對包括岸置魚叉導彈系統的 100 套系統、400 枚導彈等在內的完整採購合約一次性地照單全收！只能說，美國對台灣或許不至於直接從「戰略模糊」改為「戰略清晰」，但卻是把「戰略模糊」運用的更為靈活了。在美國新的島鏈圍堵戰略中，美國需要台灣、台灣也需要美國，形成了美台之間的地緣戰略依賴（蕭衡鍾，2022b）。

故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於 2021 年就將台灣列為「全球潛在衝突一級風險」、英國權威《經濟學人》雜誌封面故事更直指台灣是「世界上最危

險的地區」，這些都再再顯示出台海危機正在沸騰。面對國際戰略環境改變中，應該要與競合中的大國保持距離，採用彈性的外交政策，如此可避免當兩大強權進入生死相搏時，不必跟著陷入戰爭泥淖中（Kuik, 2008），台灣不應成為特定大國的代理人，不該一面倒去抗衡或扈從任何一個大國，而應採取避險政策，彈性地維持美台關係與兩岸關係的平衡，才能應對亞洲崛起、同時在美中國對峙的機遇與挑戰下保有自主權。

過去美中實力差距大，美國打台灣牌的彈性較大，但自從川普政府時期美中差距明顯縮小開始，美國為了遏止中國的崛起與擴張，台灣牌在此時的價值隨即提升，這是台灣對於美台關係升溫時應有的自覺。現在，拜登政府對中國維持「戰略清晰」、對台灣採取「戰略模糊」的策略，其戰略思維已不侷限於操作「台灣牌」為主了，而是以多邊主義方式結合盟友對中國施壓。

在拜登政府調整其亞太區域佈局中各項核心要素的比重之際，拜登政府的美中競爭態勢進入了「長期的戰略競爭」時期，再加上「川普遺產」留下來美國內部值持續釀的反中情緒，代表著「修昔底德陷阱」的結構因素未曾稍減，且在未來會保有長時間激烈競爭的狀況下，台灣也應該對此一劇烈變動的形勢重新思考，面對美中兩大強權尋求「權力平衡」的發展態勢，宜妥慎採取避險策略因應，同時兼顧兩岸關係與美台關係的經營。

因為台灣雖然被美國當作「棋子」，稱不上是玩家，且以我國的具體情況和國際處境來說，勢必無法完全獨立自主、就「時」與「勢」而言肯定會在不同層面對美中兩強有所依賴¹，但台灣仍要有自己的路、必須鞏固自己的重要性，讓其他「玩家」無法無視台灣，同時持續彰顯在供應鏈以及地緣戰略上的角色。在實踐上，可以美中雙方都需要台灣為立基點，善用

¹ 另外，雖然也有論者認為台灣政府應試圖在經濟及軍事上做到不再依賴美中兩強，但筆者個人認為此項建議以我國的具體情況和國際處境來說，在實務上無法達成，偏向於理想主義成分較多，因為就全球化與地緣政治經濟的現實面而言，基本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決策可以做到完全的獨立自主，客觀上包括美中兩強的某些政策也難免受到全球治理和區域治理的影響，例如氣候變遷與經濟轉型、瀾湄流域開發與水資源爭端、美洲整合的南北問題、海上交通線與貿易及能源安全等方面。

美中兩強爭霸下的機會之窗，在守護台灣核心價值與維持台灣主體性的大前提下，通過製造等距離的關係並採取多邊手段，既不「倚美」也不「靠中」、不選邊站或只親近其中任何一方，也不要同時遊走兩面討好，更別過於權謀博弈或是民粹操作，而是要在其間取得一平衡與穩定，以維繫我國生存發展與堅持台灣核心價值的信念來追求最大的國家利益。

討論「戰略三角」的「動態」穩定，會比研究戰略三角演變更有意義，而維持「戰略三角」關係的穩定，不導致其崩潰，對於我國來說，也是最符合國家利益的目標，用以協助避險策略的選擇，冀能在美中競爭不斷加劇趨力下，維持我國角色的自主性及影響力，在三邊博弈中拓展生存發展的空間。

參考文獻

- 李俊毅、許智翔，2020。〈美國在台海採取『戰略模糊』的可能論據與作為〉《國際情勢特刊》6期，頁13-27。
- 李景治、羅天虹，2003。《國際戰略學》。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吳玉山，2000。〈非自願的樞紐：美國在華盛頓—台北—北京之間的地位〉《政治科學論叢》12期，頁189-225。
- 吳建德、張蜀誠，2019。〈近期美中台關係展望〉《空軍學術雙月刊》668期，頁77-96。
- 威克，2017。〈台灣軍武：蔡英文承諾增加國防預算的原因〉《BBC中文網》11月3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1866688>) (2022/2/28)。
- 陳亮智，2020。〈台灣面對美國「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的因應策略〉《國際情勢特刊》6期，頁53-66。
- 黎堡，2019。〈美軍高官：美國缺乏清晰策略應對中國灰色地帶挑戰〉《美國之音》7月31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hyten-confirmation-china-grayzone-challenge-20190730/5022157.html>)。
- 舒孝煌，2016。〈效能作戰論對空權影響及近期發展〉《戰略與評估》7卷1期，頁73-98。
- 鍾志東，2020。〈兩岸灰色地帶衝突與台灣國家安全〉《國防情勢特刊》2期，頁80-87。
- 蔡榮豐，2019。〈中國干預我南太邦交國之模式與戰略意涵〉《國防情勢月報》148期，頁44-58。
- 蔡志銓、樊兆善，2015。〈中共推動一帶一路的戰略意涵〉《國防雜誌》30卷6期，頁29-58。
- 謝茂淞，2014。〈美國亞太再平衡軍事部署下的台灣地緣戰略〉《國防雜誌》29卷4期，頁59-79。
- 蕭衡鍾，2022a。〈美提升台灣為戰略聯盟 可確保台海穩定？〉《中時新聞網》11月15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11115000019-262110?chdtv>) (2022/2/28)。
- 蕭衡鍾，2022b。〈台灣在「新島鏈戰略」中將更依賴美國〉《華夏經緯網》11月11日 (<https://www.huaxia.com/c/2021/11/11/870416.shtml>) (2022/2/28)。
- Brzezinski, Zbigniew (林添貴譯)，2014。《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The Grand Chessboard*)。台北：立緒文化。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21. "Conflicts to Watch in 2021." (<https://www.cfr>).

org/report/conflicts-watch-2021) (2022/20)

Fang, Alex. 2021. "Taiwan in Danger from 2022 on, Expert Warns US Congress."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Taiwan-in-danger-from-2022-on-expert-warns-US-Congress>) (2022/2/22)

Kuik, C. C. 2008.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Vol. 30, No. 2, pp. 159-85.

Mehta, Aaron. 2021. "Give Taiwan 'Consistent' Arms Sales, Says US Regional Commander." (<https://www.defensenews.com/global/asia-pacific/2021/03/05/give-taiwan-consistent-arms-sales-says-indopacom-head/>) (2022/2/22)

Mearsheimer, John (張登及、唐小松、潘崇易、王義桅譯), 2014。《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台北：麥田。

Miller, Tom (林添貴譯), 2017。《中國的亞洲夢：一帶一路全面解讀，對台灣、全球將帶來什麼威脅和挑戰》(*China's Asian Dream*)。台北：時報出版。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2021.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2022/2/22)

Taiwan' Geographical Role and Strategy Choice under American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Heng-Chung Hsiao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Miaoli, TAIWAN*

Abstract

Due to the recent intensification and turbulence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 it is hard for Taiwan to stay out of the framework of the U.S.-China-Taiwan strategic triangle and its rol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mong the three sets of bilateral relations, accompanied by the deteriorating conflicts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 the friendly collaboration in the U.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stalemate in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tensions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will not be easily eased, and the possibility of further deterioration into military conflict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ow Taiwan can avoid being affected.

Keywords: strategic clarity, strategic ambiguity, One China policy, US-China-Taiwan relations, strategic triangle

